

希望的敌人：

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

〔美〕林塞·沃特斯 著



NLIC 2970696980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希望的敌人： 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 学术的衰落

〔美〕林赛·沃特斯 著

王小莹 译



NLIC 297069698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
(美)沃特斯著；王小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 - 7 - 100 - 07618 - 0

I. ①希… II. ①沃… ②王… III. ①人文学科—
学术工作—研究—美国 IV. ①C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24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希望的敌人：

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

〔美〕林赛·沃特斯 著

王小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618 - 0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 $\frac{3}{8}$

定价：10.00 元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Licensed by Prickly Paradigm Press LLC,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Prickly Paradigm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美国 Prickly Paradigm 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译出



清华大学图书馆
2004年10月

和

译者序

认识林赛·沃特斯是在2002年香港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有关大学人文学科如何日趋异化的论文，而这恰巧也是林赛感兴趣的问题。后来，林赛从美国寄来了他的书，也是关于大学的。书很薄，但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譬如，大学究竟为什么存在？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写作乃至发表又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的背景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市场化进程。面对这种市场化，在大学教书的人免不了对学术事业乃至大学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疑惑。对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这种疑惑就来得更强烈。人文学科曾有某种程度的独立价值，在冷战期间也一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如今，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日益泛滥，这种价值和功能正在逐渐消失。和大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人文学科也被纳入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思维框架，必须以“产量”来证明自身存在

的价值。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估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纯粹的量化过程,只涉及什么人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了什么书,或在什么档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多少人次援引了该作者的观点等等。至于这些书和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有什么学术意义,那就不在评估范围之内了。这种制度性的转变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做学问的方式。为了谋求职位职称,为了获得荣誉地位,学者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提高学术产量,就连在读研究生也难逃这种压力。一时间,写书的人似乎比读书的人还多,哪怕书还有人读,其目的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既然书已经沦为谋取职称和待遇的工具,那么读书无非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的书,让自己的履历显得更壮观,如此无穷反复。

上述问题如此明显,却又如此地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视而不见,以至于若不是有人像孩子一样率真,大声道出人们其实已经看见的东西,我们恐怕还不会向自己承认,大学作为一个理念已近崩溃。林赛·沃特斯之于人文学者,恰如那个天真的孩子之于那群佯装不知、对“皇帝的新衣”一味赞叹的世故路人。沃特斯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供职

于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现任该出版社人文学部执行主编。与一般出版人不同，他不仅是编辑，也是训练有素的人文学者，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并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及人文学科前景的重要文章，在美国学术界颇有影响。他的这本书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了英美各大报如《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关注，在美国高校亦引起很大反响。由此而来的围绕学术出版的讨论甚至扩展到了英语世界之外。至今，这本小书已先后在巴西和法国翻译出版。

以其特有的犀利文笔和罕见的坦诚，沃特斯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商业化改造之后人文学科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变化，首先是学术成果的量化管理。思想本来是无法量化的，但随着大学的日趋市场化，衡量思想的尺度越来越与思想本身无关，而越来越受制于市场逻辑，好像我们作为学者，不论写什么，只要写得多就好，顶多再加上一条标准，那就是出版社和学术刊物的名气和地位。于是，思想变得和市场上的其他商品一样，要由品牌来决定其价位。一件 Gucci 衬衫超过十件 Giordano；

同样，名牌出版社的一本书远比普通出版社的有价值。随之而来的另一个荒唐现象是，在大学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学者，而是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既然学术评估的标准不再是思想的深度和意义，而是文章数量等外在因素，与学术思想无关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自然就凌驾于从事这种思想活动的学者之上。校园越来越像公司，而教师也越来越像公司白领，被驱赶着生产一些莫名其妙、对他们本人来说越来越没有内在意义的产品。曾几何时，大学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在那里，除了思维本身的艰难之外，一个学者很少要承受什么其他的压力。难怪那时能出大思想家。现在不同了。暂且不论全球市场化这一时代性变迁是否已经从根本上限制了我们的思维空间，仅校园内的公司化管理就足以迫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真正的思想活动，而终日为自己的学术产量而苦恼和挣扎。

我翻译这本书，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沃特斯所抨击的现象，中国不但也有，甚至存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趋势。鉴于此，我们也有必要做一些反思，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是个

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作为学者整天又都在做些什么。希望这本小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日趋严重的学术产业化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王小莹

2008年11月30日

目 录

第一部	兵临城下	1
第二部	从玩世不恭到全盘否定： 现有秩序的卫道士	47

第一部

兵临城下

拿起书来读一读吧。

——奥古斯丁

我不在意你脑子慢，我在意的是，你发表的速度比你思维的速度快。

——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

使年轻作者们走向毁灭的是粗制滥造；而导致粗制滥造的是对钱的贪婪。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

在过去四年里，我曾告诫人文学的学者和出版商们，他们得对未来有所准备，那时，像我这样的出版人将不再是出书太多，而是出书太少。瞧吧，现在加州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及许多其他大学出版社都在减少人文学著作的出版量，有的还减得很厉害。目前，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数量仍处于历史最高点，但这一切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难解读的矛盾时刻，正如圣经宣告的世界末日一样。在堕入深渊之前，我们得想出自救的办法，并为未来做好

打算。

书有什么用？出书又是为了什么？我之所以在此向各位发出呼吁，是因为我酷爱书，几乎像我酷爱人类一样。如果说，这是拜物主义或偶像崇拜，我甘愿承认。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若干年前就说过，我们也许正集体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我们将告别书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的年代。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搞明白，书为什么如此珍贵，以便能努力保住它。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自己。

这篇论文是我的一个尝试，意在督促学者们采取行动，在我们沦为市场的囚徒，书失去它的价值之前，保存并保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譬如以往意义上的著书立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断重新检验的年代。正如哈佛大学出版社评议会特别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最近所说，现在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维护那些亏损单位，如果这些学科没有能力掌握新窍门或者反省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从我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出版界以来，天就已经在塌，现在的关键是确保我们脚下的地别再陷了。

我发言的角度是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学术界内

的出版人，我追求的是收支平衡，同时保持思想和书籍的尊严。我发言的另一个角度是作为学者。在我就这篇论文的观点发表讲演时，有人曾反驳我说：“既然你，哈佛大学出版社，就代表了 this 制度本身，你何以批评这一制度？你口是心非。”我回答说，大胆说话的责任首先就落在业内人士肩上。我们 these 搞出版的人不能仅仅由于职业的缘故就脱了干系。

江
南

江
南

江
山

如今，学术出版人面临四面八方的挑战：公众、纳税人、教授、学生、图书管理员和同事。有些管理人员和学术出版人似乎觉得，他们只能顺应那些毫无道理的期待，把大学出版社变成“营利中心”，为大学的总预算做贡献。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它实在很荒唐。在西方，出版业自谷登堡（Gutenberg）以来就有财政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书一向是赔本的买卖。任何东西都比书赚钱，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况且，出版界最穷的是大学出版社，从大学出版社身上榨钱就像让教堂接济的穷人为维护教堂而捐款一样。

在我看来，作为学者和出版人士，我们已经让银行家进了圣殿。既然我们不可能像耶稣那样把

他们一脚踢出去，就只能尽量限制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很多大学本身就是财政机构。别见怪，很多教堂也是一样！但大学的钱得管好，我们不能浪费了这方面的人才。而且我们还有其他人才，精神上的，而不是财政的，这些人才也需要培养。除了大学的市场化改造之外，我的第二个担心是，我确信，一旦学术圣殿落到银行家手里，那些企图掏空并借此来亵渎好书和好出版物的人就会控制许多领域，特别是人文学领域。因为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大学的各个人文学系已经完全停止了创新。也许，正如杰里米·古纳瓦德纳(Jeremy Gunawardena)所说，出版是问题关键：这是学术运作的核心。

人文学者研究书和各种人造物件，意在捕捉人性的各种表达方式。我认为，在公司化的增产要求和学术著作丧失除统计之外的所有意义这一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人文学现在处于危机，是因为在价值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预设都与人文学大相径庭（价值，说穿了，就是一个东西的市场所值）。一旦书不再是综合性媒体，而沦为统计之物，作为人文学研究对象的其他媒体也就失去了价

值。而且，如果人文学学者不牢记他们的使命，谁又会替他们记着？

在过去 30 年间发生的大学机械化改造已经对人文学科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书在西方所遭遇的，和发生在中亚的毁坏巴米扬佛雕事件一样，是一个以所谓更高价值为名义的暴力行为。我们得一切从头开始，问一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说话、写作乃至发表。我们需要重新定位，认清什么东西最为重要。我们必须敢于提出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挚爱的许多东西正面临灭顶之灾。

“做假账”(Cooking the Books): 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学的转变

我所谓“做假账”，指的是目前困扰美国各个机构的信用问题：从安达信(Arthur Andersen)的假账丑闻到各大学的分数膨胀，其中也包括学术出版的评审标准。对这样一种氛围，我们每个人都略有所知，但又都不敢概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尚不了解事情的全貌；但现在是汇总零星资料的时候了。谁都不愿在别人面前显得愚蠢，这是使我们缩手缩